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刘思慕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刘思慕 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思慕集 /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学局组织编选.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8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

ISBN 978 - 7 - 5161 - 8037 - 2

I. ①刘… II. ①刘… III. ①日本—文集

IV. ①K313.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504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赵 丽

责任校对 董晓月

责任印制 何 艳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7

插 页 4

字 数 427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是根据李铁映院长的倡议和院务会议的决定，由科研局组织编选的大型学术性丛书。它的出版，旨在积累本院学者的重要学术成果，展示他们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就。

二、《文选》的作者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资深专家、学者。他们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三、《文选》中所收学术论文，以作者在社科院工作期间的作品为主，同时也兼顾了作者在院外工作期间的代表作；对少数在建国前成名的学者，文章选收的时间范围更宽。

中国社会科学院
科研局

1999年11月14日

编者的话

“笔走龙蛇作美芹，等身著译印风云。”朱庭光同志的七绝句，高度概括了思慕同志用手中笔作刀枪，与敌对势力斗争，文笔犀利，又文字优美的写作生涯；形象准确地评价了思慕同志著译丰硕，紧密配合现实斗争的辛勤笔耕，坚定地在国内风云变幻中战斗的精神。

刘思慕同志，大家亲切地尊称他为刘思老。他是一位“出生入死临危不惧”的革命者，是一位忠于真理、为国家民族和人民献身的坚贞斗士，又是一位“诗笔挥来如有神”的诗人和散文作家，更是以其著译均与时代息息相关、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国际问题专家和历史学家。

刘思慕，原名刘燧元。广东新会人。1904年1月16日生于一个职员家庭。

1926年11月，思慕经孙中山原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介绍，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五班学习，于翌年7月回国。为追求革命真理，又于1932年春只身赴德国、奥地利自费留学。在德、奥一年多的留学生活，扩大了他的视野，增加了他对国际形势、对

德国法西斯主义、对人民阵线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机等问题的感性认识，这为他以后深入研究国际问题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由于经济困难，他被迫于1933年秋回国。离欧前夕，他在维也纳写了“留别欧洲的朋友们”的抒情长诗《流转》，表达了留学德、奥时的革命浪漫主义情绪。在他回国后撰写的长篇散文集《欧游漫忆》中，描绘了“暴风雨前夜的柏林”，并以讽刺的笔调勾勒了戈培尔在露天酒馆疯狂叫嚣的场面，记述了“历史的花叶惨然变色后”的人民的苦难，抒发了他“泞盼赤色风暴的袭来”的慷慨奋激的心情。王瑶教授在《野菊集》序言中评论道，思慕同志这些作品在发表的“当时就产生了引人注目的社会影响，受到读者广泛的欢迎”，“作者的文笔优美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容富有时代感和现实感”，“这些作品不仅是现代文学史上理应珍视的文献，而且今天仍然有它的现实意义和美学价值”。——

思慕胸怀报国之志于1933年秋回到广州，后在上海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深入虎穴开始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搜集国民党的情报。因被叛徒出卖，蒋介石下手令“拿办他”，C.C头子陈立夫也下令通缉他。思慕辗转逃至泰山，由于冯玉祥的保护，得以脱险逃亡日本。冯玉祥在其遗著《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曾述及此事。

1936年春，思慕只身逃往日本避难，化名刘希哲。在东京一年多，深居简出，一边学日语，一边翻译、写作。他翻译出版了60万字的《歌德自传》（生活书店，1937年版），还用思慕及其他笔名给国内报刊《申报·〈自由谈〉》《申报半月刊》《世界知识》《中流》等杂志写短文，并开始写《闲话日本宗教》等有关日本问题的著述。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卢沟桥的枪炮声，对刘思慕来

说，犹如听到“天外传来祖国战斗号角的呼唤”，为了投入抗日工作，他冒着被蒋介石通缉杀头的危险，于1937年7月底回到了上海。

思慕从日本回到祖国后，随即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从事抗战宣传、新闻工作。他在上海、武汉等地，宣讲国际时事及其他政治问题，为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写了许多文章。后来又在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和雅加达侨报《天声日报》工作，写下了大量新闻报道和评论文章。他还挤出时间为生活书店撰写《日本的财阀、军部与政党》（《黑白丛书》）和《中国边疆问题讲话》（《青年自学丛书》），在为宋斐如主编的《战时日本》写稿的同时，还与郑森禹等合编《战时日本全貌》一书。并在1940年出版了《战争途中的日本》和《欧战纵横谈》等著作。

上述几部书籍，是思慕这一时期的有重要意义的代表性著作。《中国边疆问题讲话》一书，对帝国主义侵略进行了严厉的揭露和批判，遭到蒋介石政权的查禁。《日本的财阀·军部与政党》一书，可说是我国学者首次深入分析日本财阀、军部、官僚三者关系的力作。不仅集中阐述了日本这三种政治力量的性质、内容和作用，而且以日本法西斯化进程为中心，考察了他们彼此间的关系和演变。该书分析了“在法西斯化行程上财阀、军部由‘对立’而到提携”的演变，指出官僚在财阀与军部勾结方面的作用及地位：“法西斯化工具——新官僚与军部财阀的勾结”，“并且在军部和财阀之间尽了拉拢和牵线的任务”。全书在最后对日本政局的趋向做了分析，许多都被后来时局的发展所证实。特别是《战争途中的日本》一书，是思慕在这一时期对日本问题进行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这部著作对日本政治、外交、财政、经济以至社会文化各个方面，都做了深入广泛的研究。它探讨了“在战争前夜日本国内外情势”，从“日本军事法

西斯化的迈进”“日本工潮的澎湃”“最近日本的党狱”“日本政变中右翼运动的抬头”等四方面阐述了日本政治矛盾的尖锐化，从“日本对华强硬政策的里面”“‘反苏神圣同盟’声中的日苏国交”“日德协定在日本国内的反响”“政战火上的日本外交”等四方面说明了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与挣扎”。它更用深刻的笔触对1937年后一年多日本的“军事法西斯独裁的加强”“议会风波”，“从广田外交到宇垣外交”；“战时财政经济的难关”“战时日本的社会文化”“反战与社会革命危机”做了阐述。本书令人信服地说明了日本军事法西斯主义怎样从加紧备战，走到疯狂的侵略战争之途，指出它必然走上最终的崩溃，可说是一部现实感颇强的研究著作。《欧战纵横谈》在香港《星岛日报》连载时，因其观点正确，文笔锋利，曾屡次遭到香港英国当局的检删。这部著作对德国纳粹并吞奥地利、捷克，瓜分波兰进行了抨击，对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总理达拉第推行绥靖政策，向希特勒低头，大搞慕尼黑阴谋亦进行揭露。他还对“奇怪的战争”的真相做了揭示，描述了莱茵河畔、齐格菲阵线附近英法联军与德军对峙地区，一片静寂悠闲的“西线无战事”景象，这与大火熊熊的华沙末日的悲惨画面，形成强烈对照，淋漓尽致地表现出英法的背信弃义、见危不救的丑态。

思慕在致力于国际问题论著之余，重新拿起他早年所酷爱的散文创作。其中主要是在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申报·〈自由谈〉》上连载的散文《樱花与梅雨》。它通过对日本国情的具体描述，写出了日本在战云笼罩下一般市民的窒息忧郁的生活气氛，有对日本畸形社会漫画式的描绘，有对日本社会和民族心理的病态特点的剖析，也有对同样遭受战争苦难的“日本兄弟们的深切同情”，因而强烈地反映了慷慨激昂的时代气氛和思慕的爱国热情，与《欧游漫忆》一样，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迎，产

生了引人注目的社会影响。

1940—1945年，思慕历尽苦难，先是1940年夏离港出走爪哇巴达维亚城（今印尼雅加达市），接着是1941年12月—1942年春的死里逃生，从印尼脱险，经科伦坡、加尔各答、缅甸等地回到昆明，此后又过了近一年的军旅生涯。1943年春到衡阳担任《力报》总主笔，并于1944年年初与羊枣、张铁生等执笔编写了20多万字的《战争中的世界》，因受审查时“遗失”而未能出版。1944年夏到桂林，任《广西日报》主笔一个月，经历了伤心惨目的湘桂大撤退，从桂林逃到贵阳，到1944年冬，历尽艰辛，才到达昆明。在李公朴的鼓励下，他参加了中国人民救国会，翌年（1946）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他又在美国新闻处任编辑，余时便为《民主周刊》《云南日报》《扫荡报》《正义报》《真报》及《评论报》等撰写国际评论以及抨击国民党统治区腐败黑暗的杂文，直到抗战胜利。

1945年年底，思慕举家迁至香港，参加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宣传据点《华商报》的复刊工作，担任该报总编辑。从此，他直接在党的领导下从事人民的新闻工作。他还兼任中国新闻学院院长，也担任过达德学院教师，主讲《社论研究》，也常去做时事报告。这一时期，他还兼职主编《世界展望》半月刊。1949年初，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香港《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离港北上，思慕又应邀任该报总编辑，原由陆诒主编的《光明报》，刘尊棋、金仲华负责的英文《远东通讯》，都因陆、刘、金秘密北上，交思慕主持；他一身数职，更是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

思慕精力充沛，才思敏捷，辛勤耕耘，他在繁忙的业务工作之余，在艰苦的条件下，仍从事国际问题和日本历史及现状的研究工作。从1948年7月开始执笔一个月后即完成的10万字专著

《战后日本问题》，便是他在香港时期的代表作。这是一部涉及战后日本各个主要方面的综合性研究著作。这部著作，依据当时中国、日本、美国的各种资料，对日本战败投降、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及对日政策、战后改革、东京审判、日本人民运动和日本经济复兴等刚发生不久，或正在进行的事件都做了阐述，书中关于战后改革中的“解散财阀”和“农地改革”的论述，本身就是两篇精彩的专题学术论文。这部著作还将日本的被占领和管制的方式与德国的情况作了比较和对照，揭示两者“大不相同”的实质；同时从历史的角度，对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及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等历史特点做了追溯，不仅比较分析了战后与战前日本的不同（如对“新宪法”与“明治宪法”作的比较分析），而且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的异同，也作了对比分析。书中写道：“日本既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与英、美、德、法等帝国主义国家一样，它是给独占大资本家所支配的”，“但是，比起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来，战前的日本帝国主义却有一些不同的特点。那就是，它是一个特殊形态的法西斯国家——带有浓厚的封建气味的军事法西斯国家”。“这即是说，日本的法西斯化是通过军部独裁的形式来推行，在法西斯的舞台上，军人站在前台，而大财阀居于幕后。”“日本的资本主义虽有高度的发展，但封建制度和势力仍在日本的政治和经济机构中占重要的地位。这首先表现于天皇和天皇制……天皇实是日本最高的政治负责者，而不是像英国君主那样有名无实。”这部著作的广阔视野、深刻洞察力和犀利准确的笔触，即使时隔66年后的今天读来，亦使人惊异和钦佩。

郭沫若同志对这部书做了很高的评价。郭老在为这部书写的《序言》中说，刘思慕“在业务的百忙之中写出了这部《战后的日本问题》，把三年来的日本近况和美帝扶日的真际，几乎毫无

遗漏地暴露了出来。这实在是一部最切合时宜的力作”。“当我把这部力作一口气读完了之后，我低下头来了。我默祝着：这样的一部好书，实在是应该人手一部的。”“我要向思慕先生表示感谢并祝贺，他实在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我要想到他的业务百忙而资料实在也不容易到手，能够有这样的成就，已经足以惊人了。”“作者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尤其值得我们学习。”

思慕在香港时期的另一部著作是《战前与战后的日本》。这本书，深入浅出地阐述了“日本原是怎样一个国家”“地理上有甚么特色”“日本人是天生侵略的民族吗”、“日本怎样强起来的”、“过去怎样侵略我国”等战前日本历史问题。也有针对性地回答了“战后统治日本的是些什么人”“日本经济真个复兴了吗”“日本人民的觉悟和力量怎么样”等战后日本的现实问题。该书通过充实的资料，深刻地分析了近代日本对外侵略的原因：“归根到底，现代日本的对外侵略还是因为这个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很快就成为帝国主义国家”，“与日本的民族性并没有什么关系”。这部书还用确凿的史实驳斥了原子弹决定日本投降的论调，较全面地科学地阐述了日本投降的各种因素：“谈到日本怎样会被打败，不少美国人归功于原子弹的威力”，“平心而论，原子弹的功劳是有一点的，但并不是决定的因素”，主要的原因，“首先是日本本身的弱点”，其次是苏联参战“有决定性的作用”，“最后，中国八年抗战的功劳是不可埋没的”；“一句话，打败日本主要是靠中、苏、美军民的血汗，而不是靠一两颗原子弹”。

1949年8月底，新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在北平召开，思慕以华侨代表的身份被邀参加。10月1日开国大典时，他应邀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新中国成立以后，思慕于1949年10月15日去上海，任

《新闻日报》总编辑；翌年初，兼任上海文化局副局长，并兼了不少如“和大”“中苏友协”“文联”“记协”等人民团体的领导职务。他在紧张的公务和频繁的社会活动之余，还挤出时间勤奋地写作。除在报刊杂志上发表大量国际评论和随笔外，在上海的五六年，还为世界知识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华东人民出版社等撰写了专著《美国重新武装日本问题讲话》《美帝军事狂想的破灭》《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时刻记住资本主义包围的存在》《中东的革命风暴与侵略火焰》《怎样学习国际时事》以及译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论》等，这些著述，不仅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而且均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由于他总是怀着极大的热情，精力充沛地对待工作，当时在上海的同志送给他一个“雅号”叫作“刘积极”。

1954年3月，思慕以中国记者团团务委员身份参加了由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出席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他竭力去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频繁地出席各国代表团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与各国新闻记者广泛接触，阅摘各国代表团所散发的大会材料和各报社、各通讯社的大量报道。他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及时向国内用电报发回十多篇通讯以及会议花絮式的专电。回国后又在《世界知识》上发表了连载的《日内瓦散记》。思慕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的活动受到记者团党组的重视和读者的好评。

思慕于1956年3月至1957年7月调北京任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兼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后又奉调回沪任《新闻日报》社社长，后合并成《解放日报》，任副总编辑。

1957年思慕向党提出了入党要求，很快得到了批准。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奋斗，思慕同志终于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

1960年5月，他兼任新成立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一年后回到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任副所长，潜心研究国际问题和世界历史。除重点研究欧洲经济共同体、美欧关系课题之外，1962年曾以专家身份出席在加纳阿克拉召开的第一届非洲史学会议，1964年参加了北京国际学术讨论会；1965年又参加了阿尔及尔第二届亚非会议的专家会议。

在十年动乱期间，思慕被隔离、抄家、批斗，又到江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几年间在暗淡的油灯下一直写那写不完的“交代检查”，劳目伤神。1973年患视网膜脱离，因拖延时日，致右眼视力无法恢复。卧病近百日，曾在病榻写下抒怀七绝四首。其中一首道：“不愁华佗医无术，总比丘明胜一筹。远瞩高瞻凭马列，犹留只眼眺全球。”充分表现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身受残酷迫害，但对党和人民事业的信念仍坚定不移，对马克思主义坚信不疑。他的心始终是向着党和人民的，当他刚被解除隔离补发39个月的工资时，他将其中四千多元作为党费上缴，“靠边站”时期，亦将每月工资的一半上缴，合计近九千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坚决拥护并积极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常以“将被十年浩劫耽误了的时间夺回来”自勉，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勤奋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979—1982年，思慕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1982年后改任世界历史研究所顾问，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教授。在此期间，他关心和致力于我国世界史学科建设，为推动学科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他在研究所领导工作中，在个人的研究工作和培养年青一代的过程中，总是反复强调历史研究要与现实相联系，要注意为现

实政治斗争服务。他在史学研究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又十分重视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针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在《为争取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我国世界史研究的落后面貌而努力》一文中说：“我们决不能走资产阶级史学家‘为历史而历史’的老路，我们要坚持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世界史研究的对象是世界的过去事情，离现实远一点，但它仍能为现实政治斗争、为‘四化’服务。”他在《从国际现实谈到世界史研究》一文中又说：“学习研究历史，不是单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要结合现实，着眼现实，我们通过历史（本国的和世界的）研究，能够更清楚地认识世界，以便更好地改造世界。”他在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第一部关于日本明治维新的专题文集《明治维新的再探讨》写的《序言》中，不仅阐发了明治维新史研究的学术意义，而且强调了其现实意义。他说：“从日本近代史学科本身建设的需要的角度来看，作为日本历史发展的里程碑的明治维新有待于我们系统深入的研究；结合我国目前‘四化’建设的需要来看，为了借鉴历史经验，我们也要确切地了解日本怎样从明治维新（堪称‘第一次近代化’）的昨天演变为经济高速度发展的今天。”

思慕对国际关系史有深入的研究，发表过不少著述，提出了很多引人注目的观点。例如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产生及其国际意义》一文中认为，列宁是在1919年9月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思想的。他说，那时列宁预见到随着国内战争的胜利，国际关系将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的时期”。提出这一思想的历史背景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兴起的欧洲革命高潮已经过去，俄国共产党（布）已明确提出将党的中心任务转向经济建设的新轨道。思慕的这一观

点及其分析，与认为十月革命一胜利列宁就提出并执行和平共处政策的传统观点是不相同的新观点。

1980年，思慕作为中国史学家代表团副团长，出席了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第十五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他向大会提交了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宣传工作》的学术论文，并在大会的分组会上宣读，获得了各国史学界同行的好评。回国后，他写下了万言的《罗马尼亚见闻》长篇通讯，并收集了旧作，交由重庆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了《国际通讯选》，谁料竟成为他最后的遗著。

在歌德逝世150周年时，他于1982年完成了重译出版《歌德自传——诗与真》的巨大工程。在长达12000字的新《序言》中，他对歌德的评论，已不仅是一般文学评论，而是一篇很好的评价历史人物歌德的学术论文。他从歌德的哲学思想、宗教观、社会历史观三方面对歌德的两面性做了深入的剖析。他指出：“歌德的这种两面性，是同他在世界观方面的更根本的两面性有密切的关系的。”他最后写道：“总的来说，歌德在世界观方面的主流还是唯心主义（带有神秘气味的唯心主义），而不是唯物主义；是个人主义，而不是集体主义，是英雄史观，而不是群众史观。”“作为反映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时代精神和矛盾的诗人和思想家，歌德的成就和贡献是伟大的。”值得一提的是，思慕重译此书，是极端认真负责的，他除根据原文版本以外，又参考了英、日译文及其他歌德传记，充分发挥了他掌握六国外语（英、德、俄、日、法、西班牙）的优势。顺便提到，思慕一次与一位英国记者交谈，那位记者对其英语水平之高很惊异，问他毕业于英国哪所大学，哪里知道他是在中国土地上，主要靠自学掌握多种外语的。

思慕着力研究的另一个课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他认为，

当前研究这段历史是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无论是为了明确第二次世界大战当年与今天国际形势的同异，认真总结和充分吸取这场人类空前浩劫的经验教训，从而朝着正确方向努力，制止或延缓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或是为了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纷纭众说中辨明真相，澄清是非，准确地还原二战史的本来面目，从而加深我们对于现代战争的根源、本质及其规律性的认识”，都要求我们迅速地把“二战”史的研究搞上去。他在“二战”史研究中特别强调应注意中国抗日战争在“二战”中的地位和作用，因为“我国是抗击法西斯侵略者最早、时间最长、遭受牺牲和损失很大的国家”。他在《中国抗日战争及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认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中国战场成为打击日本法西斯的主要战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仍然是亚洲大陆上同日本侵略者斗争的主要战场，有力地支援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

思慕 80 岁高龄时，还在带研究生，还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交学院兼课，并到上海复旦大学讲学。对所讲的四个专题每篇都专门写了讲稿，一遍又一遍地逐字逐句进行推敲，并尽量采用最新的资料，为了把讲稿准备得更充分些，他甚至推迟了行期。他为一系列世界史研究著作或论文集写下一篇又一篇的序言，这不仅需要他认真审读论著，而且还在篇篇序言中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和指导性的观点。他身兼数职，参加一系列会议，并认真准备讲稿。如他任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参加了 1980 年在天津举行的第一届年会，作了报告，1982 年在沈阳举行第二届年会时，他虽未能亲临，亦认真地寄去了 3000 字的书面发言稿《谈谈有关日本史的几个问题》。他有求必应，为一位又一位副教授、副研究员晋升职称评阅论文，为一家又一家报纸杂志撰写文章。他为老朋友落实政策出具证明，为老战友的冤案